

城市包容性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周 密 张颖昕

摘 要 提升城市包容性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新时期我国推进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作者以城市包容性中异质友好、群体多样、发展导向三大特征为线索，在系统梳理城市包容性理论内涵、量化测度和评价体系及主要经济变量影响机制基础之上，探究城市包容性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理论逻辑。同时，在总结梳理西方城市包容性研究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城市包容性制度建设经验，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并对未来城市包容性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城市包容性 新型城镇化 异质友好 群体多样 发展导向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851X (2021) 03 - 0077 - 16

一、引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进，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是从主要依赖某些高科技行业或创造性行业，转向依赖不以行业区分的创新阶层的创新活动。这个创新阶层的生活习惯不拘一格，他们更多的是依赖灵感等思维活动，有效地促进思想交流和资源整合，从而促进包容开放的社会环境的形成。在这种趋势下，城市发展正在实现从“汗水”到“灵感”的转变（Florida, 2002），城镇化过程也逐渐变成了由包容性逐步取代排斥性社会系统的内生进化过程（何景熙，2011）。

目前我国城镇化已经步入提质升级的重要时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工业化阶段，新型城镇化侧重于人的生存需求，要求加快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研究”（批准号：20FJLB012）；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研究”（批准号：ZB21BZ0207）。

【作者简介】 周密（1980 - ），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邮政编码：300071；张颖昕（1998 -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格拉斯哥硕士研究生，邮政编码：300071。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匿名评审，当然文责自负。

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城镇化的规模性、效率性和便利性。但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新型城镇化更侧重于人的发展需求,要求加快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和中高端服务的提供。

因此,提高城市包容性成为决定城市结构转型与经济质量提升的关键变量,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以包容性为特征的人文环境比以效率为特征的商业环境更为重要。

由于城市包容性既需要理论探讨,也具有实践意义,因此本文一方面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梳理,力求以较为全面的角度来看待城市包容性;另一方面希望能为中国城市发展实践提供一些经验借鉴。为此,本文将着重关注以下五个问题:一是城市包容性的经济学内涵是什么;二是如何科学考量城市包容性;三是如何提高城市包容性;四是西方城市包容性研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有何启示;五是城市包容性有哪些研究方向值得拓展。

二、城市包容性理论内涵与基本特征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功能始终在不断演变,经历了由最初的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安全功能向以商贸和工业发展为主的经济功能、再向以舒适性为主的生态功能和以多样性为主的社会功能的转变。城市包容性体现了对人才、科技等多元要素和多样化的吸引,体现了城市经济、生态、社会等综合功能,在城市经济学领域受到了广泛关注。下面首先对城市包容性理论内涵和基本特征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总结。

(一) 关于城市包容性理论内涵的讨论

Florida (2002) 首次提出包容性的概念,认为包容性对吸引创意人才、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作用。

以往的城市包容性研究,通常包含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四个方面,且认为这四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并共同作用于城市主体的融合过程。城市包容性既反映了城市对来自不同地域,或拥有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等不同人群的接纳程度,也反映了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以及不同群体分享城市发展成果的程度。

包容性的理论内涵并不统一,有的学者倾向于将之看作个人或集体对待特定人群的态度,或是民族认同的特征(Epstein, 2017)。Florida (2002) 等经济学家将城市包容性具体化为对不同群体和行业的开放态度。Lorenz 和 Schmutzler (2018) 认为城市包容性意味着居民对区域范围内群体间社会、文化和种族多样性的开放程度,认为至少是两个不同群体的共存和整合。总体来说,西方学者认为城市包容性的基本内涵是,城市在基本制度、基础设施、居民态度等方面能够对有异于自身的个体或群体保持开放平等,减少其他群体进入以及长久居住的障碍。基于此,西方城市包容性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允许共存。所谓允许共存,就是允许与标准之间存在偏差,即允许与

自己不同甚至相冲突的观念或行为存在，从而形成相互融合。

（二）城市包容性的基本特征

概括起来城市包容性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异质友好性。异质性是指偏离日常行为标准的“非传统”的特征、行为或价值观等。如 Florida 和 Gates（2003）将城市包容性定义为欢迎非传统的人，如同性恋、艺术家和思想自由的“波西米亚人”。异质友好性的含义就是包容差别，即允许不同个体独特性的存在。建立在异质性基础之上的城市包容性，强调对普遍存在于价值观、认知等各个方面的异质要素的包容和平等对待，特别是对拥有异质特征的个体的包容和友好。一些研究认为，城市包容性与创新密切相关。同质性要素的聚集更多地产生利用型创新，而异质性要素的聚集更能产生探索型创新（詹·法格博格等，2009）。Florida 和 Gates（2003）认为，多元化、包容性的城市是培育创造力和创新的理想场所，科技行业的人被那些以包容、开放和文化创造性为特征的地方所吸引，他们的加快聚集，有利于实现城市多元共生、开放包容的创新发展。

二是群体多样性。群体多样性是指对多元群体的包容，强调不同群体的共存和融合。在这里包容性可以定义为开放、宽容和多样性。Lorenz 和 Schmutzler（2018）在研究中使用种族和移民来代表社会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也有研究使用不同种族的共存和融合来代表群体的多样性（Dohse and Gold, 2014）。多样性是城市包容性的重要表现，Easterly 和 Levine（1997）认为，多样性可能导致产生信任感缺失的社会问题，增加冲突的可能性，包容性是这些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一些研究认为，只要一个城市表现出足够的包容性，就能够产生较为良性的多样性以及更好的经济效益。

三是发展导向性。发展导向性是指不同群体的平等发展，有的研究从社会融合的角度主张对低收入阶层给予更大的包容（李叶妍、王锐，2017）；有的则强调，所有个体机会均等地参与经济活动，从而实现所有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和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以体现“包容共生”的价值尺度（倪明胜，2012）。

发展导向性这一特征融入了一个与城市包容性非常接近的概念，即 2007 年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强调保证弱势群体参与增长过程和享有增长成果，被视为“益贫式增长”。这一概念着重强调形成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具有明显的扶贫济弱特性。近年来国内很多文献将这一概念应用于研究城市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与社会保障问题（魏婕、任保平，2011；倪明胜，2012；李叶妍、王锐，2017；周颖刚等，2020）。总之，包容性增长重点在于关注社会的公平、公正发展，目的是使经济发展红利惠及所有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人群。

三、城市包容性的测算与评价

围绕异质友好、群体多样、发展导向三大特征，以往研究形成了对城市包容性测

算的三种指标选择思路,并通过区间划分、纵向对比、横向对比等对城市包容性水平测算结果进行评估。

(一) 定量测算中三种不同指标的选择思路

第一种主要是基于异质友好的视角进行测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选用同性恋指数、波西米亚指数指标,测算特定异质性人群的比例;二是以针对特定问题的态度,体现城市的包容程度,其中同性恋指数(一个地区同性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被认为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地方的领先指标”。较高的波西米亚指数(衡量艺术人口如艺术家、音乐家、作家、演员、导演、设计师的比例)代表活跃的艺术与文化环境,有助于城市包容性发展。Florida(2002)在各种研究中主要使用了同性恋指数和波西米亚指数来测度城市包容性。对同性恋者的包容程度还可以通过结合涉及同性恋者的公民权利的项目来衡量,例如在社区发言的权利或在大学教书的权利(Ostheimer and Ritt, 1982; Gibson and Tedin, 1988; Gibson, 1992)。Bakens等(2013)认为基督教政党的高投票率标志着某种程度的同质性,并使用一个城市的基督教政党在1982年、1986年、1990年和1994年四次选举中的选票份额来衡量城市包容性。刘洋等(2019)借鉴Florida(2002)的研究思路,同时考虑到中国的特定社会背景,认为对性问题的包容态度能够体现异质友好程度,并选取CGSS数据库三个涉性问题的得分构造了文化包容指标。

第二种是基于群体多样性视角的测算。主要通过衡量移民区域密度的大熔炉指数(Florida, 2002)、细分指数(Ottaviano and Peri, 2006)等指标进行测算,这些指标选择可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出生国人群分布数据。细分指数表示任意一个城市中随机选择的两个人出生在不同国家的概率。这种方法的运用在理论上存在两种极端情况:如果一个城市完全由出生在本国的人居住,细分指数将为0;如果一个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出生在不同国家,该指数将等于1。这一指数解释了群体多样性的两个主要方面,即“丰富性”(群体数量)和“均匀性”(均衡分布),这两个因素都有助于多样性群体的形成。Bakens等(2013)构建了与多样化群体存在相关的餐厅多样性指数来衡量城市包容性,该指数基于城市中每家餐厅厨师的国籍信息进行构造。

第二类是民族分布数据。Dohse和Gold(2014)认为,一个地区的多样性是由该地区人口中民族的分布,即包括土著民族在内的几个民族文化亚群体的相对规模决定的,这种方法使用通过民族分布度量多样性的泰尔指数来计算城市包容性。Lorenz和Schmutzler(2018)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通过一系列问题建立包容度指标,这些问题要求受访者回答他们是否愿意与特定群体(指代不同种族的人以及移民或外国人)做邻居,每个区域给出肯定答案的受访者占比被用来衡量包容度。Persell等(2001)采用白人邀请黑人共进晚餐、支持异族通婚和投票选举黑人总统的意愿程度等来衡量城市的包容性。在一些研究中,对学校种族隔离、校车接送和社区种族隔离的态度等也被用来衡量包容程度(Tuch, 1987; Case et al.,

1989)。除此之外，黑人占比、亚裔占比和西班牙裔占比也曾作为群体多样性的替代指标被使用（Qian and Liu, 2018）。

第三种是基于发展导向性视角的测算，主要采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类指标。李叶妍和王锐（2017）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两维度构建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数指标体系，以社会保险参加情况、劳动权益保障程度、公共服务享受范围为主要内容，设计五险一金和补贴性住房等 7 个指标，重点体现城市对于外来人口中不同能力（受教育程度、经济能力）、不同职业，以及不同出身等类别群体及其家庭成员的接纳程度。结果表明，城市包容度越高，外来流动人口融入越容易。周颖刚等（2020）借鉴李叶妍和王锐（2017）的研究，从社会保障，社会服务以及城市吸引力三个要素来构建城市包容性指标。魏婕和任保平（2011）从增长前提条件、增长过程要素和增长结果三个层面选取了 35 个指标来研究城市包容性。

为了更简洁直观地展示城市包容性定量测度中通常使用的指标体系，表 1 从异质友好性、群体多样性和发展导向性三个角度对上文介绍的指标进行了总结和梳理。

表 1 包容性指标体系分类

研究角度	学者	包容性指标体系
异质友好性	Florida(2002)	同性恋指数、波西米亚指数
	Ostheimer 和 Ritt (1982); Gibson 和 Tedin (1988);Gibson(1992)	涉及同性恋者公民权利的项目
	Bakens 等(2013)	基督教政党选票份额
	刘洋等(2019)	对性问题的包容度
群体多样性	Florida(2002)	大熔炉指数
	Ottaviano 和 Peri(2006)	细分指数
	Bakens 等(2013)	餐厅多样性指数
	Dohse 和 Gold(2014)	泰尔指数
	Tuch (1987); Case 等 (1989); Persell 等 (2001);Lorenz 和 Schmutzler(2018)	对不同种族、移民的态度
	Qian 和 Liu(2018)	外裔占比
发展导向性	李叶妍和王锐(2017)	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周颖刚等(2020)	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城市吸引力
	魏婕和任保平(2011)	增长前提条件、增长过程要素、增长结果

（二）对城市包容性水平测算结果的评估

以往学者对城市包容性水平的测算结果主要通过区间划分、纵向对比、横向对比来进行评估。张明斗和王雅莉（2016）将包容性进行区间划分，分为高度包容型（ $0.5 \leq I$ ）、中度包容型（ $0.4 \leq I < 0.5$ ）、低度包容型（ $0.3 \leq I < 0.4$ ）及非包容型（ $I < 0.3$ ）四大类型。通过纵向对比，2004—2013 年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呈现

一种上升与下降交叠的“M”型发展趋势，未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动（张明斗、王雅莉，2016）。横向对比包括国际比较和国内比较，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包容性整体上始终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城市包容性发展不足（洪扬等，2021）。王晓艺等（2019）的研究表明，我国不同地区的包容性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对包容性内涵及测算逐渐形成了异质友好、群体多样和发展导向三个侧重点，但目前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量化指标，主要是因为对包容性的理论内涵尚未达成共识，侧重点差异较大，使得包容性指标选择范围较为分散。除此之外，与其他相关概念的混淆使用也使得包容性的一些属性和特征被忽视，因此，有必要对包容性概念进行更为精确的理解和定义。

四、城市包容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城市包容性对城市建设和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如何为城市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是以往研究的重点内容，但不同学者的研究方向有所侧重。下面对城市包容性影响和作用机制进行梳理与总结。

（一）城市包容性的影响

从宏观角度来看，城市包容性影响着城市经济发展；从微观角度来看，城市包容性影响着企业等城市微观主体的发展。

1. 城市包容性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Florida（2002）、Florida等（2012）认为，包容性对城市规划研究和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影响住房价格（Florida and Mellander，2010；Ottaviano and Peri，2006），推高房价。许多研究表明，同性恋和艺术家群体是城市先锋，他们的选择对房价有积极影响（Ley，1994；Zukin，1995；Smith，1996）。Florida和Mellander（2010）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以波西米亚—同性恋指数测算的城市包容性与房价有直接关联，其他关键变量（尤其是收入）对房价有间接影响。城市群体的多样特征是影响房价的因素之一，Saiz（2003）提供了移民流入对城市租金产生积极影响的证据，包容性高的城市有更高的工资和更高的租金，如包容性指数每增加0.1，美国本土居民的平均工资就会增加13%，租金也会增加19%（Ottaviano and Peri，2006）。陆铭等（2014）基于对中国地级市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规模等因素后，外来人口（移民）占比更高的城市房价会更高，移民占比变化更大的城市，房价和房价增长率也会更高。

第二，影响城市产业发展。包容性高的城市在高科技行业更具创新性（Florida，2002）。一方面，城市可以利用包容性带来的多样性作为卖点，鼓励旅游业发展或其他流动资本的投入（Thomas and Darnton，2006）。新奥尔良的狂欢节被宣传为多样化

“消费”的产物 (Gotham, 2002), 而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将首都的多样化作为营销工具。另一方面, 信息共享等所产生的积极效应主要适用于创造力和高技能的高端产业 (Sparber, 2010)。同时, 城市包容性既与艺术、设计和娱乐职业有显著的关系 (Mellander and Florida, 2011), 也与高科技产业的集中密切相关。

第三, 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城市包容性对城市经济的影响还反映在工资、收入、就业、地区生产总值等方面 (Florida et al., 2008, 2012; Qian, 2010; Mellander and Florida, 2011; Lee, 2011)。Noland (2005) 发现, 城市包容性对全球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有积极影响。如城市包容性与工资和收入有正相关关系, 且与区域发展成果显著相关 (Florida et al., 2008)。城市包容性表现出的多样性, 如工业、消费品、服务、创造性职业, 以及人口的多样性等是城市发展的关键引擎 (Jacobs, 1969; Bairoch, 1988; Fujita, 1989; Quigley, 1998; Glaeser et al., 2001; Florida, 2002)。Brunow 和 Brenzel (2012) 以欧洲国家为研究对象, 发现种族多样性具有积极效应。Dohse 和 Ott (2014) 将具有异质技能的经济主体 (企业家) 纳入熊彼特增长模型, 发现靠近世界技术前沿国家的增长和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不同技能的经济主体的适当平衡。文化多样化的人口也是城市的重要资产和关键特征 (Smith and Sassen, 2006)。根据 Dohse 和 Gold (2014) 的研究, 区域经济表现和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显著而稳健的相关性。总之, 一个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与其人均 GDP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 城市包容性对微观企业的影响

企业是城市发展的微观主体, 也是城市经济的主要支撑者。城市包容性对微观企业能够产生积极影响, 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创新和创业三个方面。

第一, 对提高企业生产力具有积极作用。异质性的个体或者多样性群体拥有不同的生产技能, 他们解释问题和利用认知能力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同, 这是城市包容性与生产力之间的基本关系。因此, 更异质的社会可能表现出更强的生产力 (Alesina and Ferrara, 2005)。Lazear (1999) 建立了一个包容性对团队生产力的正向影响模型。Ottaviano 和 Peri (2006) 通过对美国城市水平数据的统计, 发现包容性对生产力具有积极影响, Nathan (2011) 也通过英国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Alesina 和 Ferrara (2005) 利用 195 个国家的数据, 建立了包容性和生产率之间的正向联系, 结果表明城市包容性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效应。有关团队组织和管理的相關研究也认识到了包容性的积极“生产价值” (Lazear, 1999)。

第二, 对企业创新有正向影响。城市包容性有助于增强企业开发和新产品创新能力 (Lorenz and Schmutzler, 2018)。有研究认为, 城市包容性使更多样化的地区的专利数量显著提高 (Dohse and Gold, 2014)。移民对专利行为的积极影响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得到了验证 (Gauthier-Loiselle and Hunt, 2010; Bosetti et al., 2015; Fassio et al., 2019)。Lee (2014) 发现英国拥有外籍企业家或拥有合作者的企业更倾向于开发新产品。Niebuhr (2010) 利用德国的数据, 建立了文化多样性和

企业创新活动之间的积极联系。

第三,城市包容性与创业之间存在积极而显著的联系(Qian, 2013)。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包容性中的群体多样特征所表现的人口和社会多样性是新公司形成率的预测因素(Qian and Liu, 2018)。Lee等(2004)认为地区多样性与以新企业设立为目标的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二是城市包容性的发展导向提高了家庭创业的概率。周颖刚等(2020)采用流动人口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程度来度量城市包容性,发现城市包容性每提高1%,选择创业的人口就会增加1431万人;相应地,这些创业人口的人均年收入会增加6010元。

(二) 城市包容性的作用机制分析

城市包容性对城市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影响是通过不同渠道或机制发挥作用的。本文将城市包容性作用机制概括为创新阶层聚集、溢价、知识溢出、风险平滑、循环累积等五个机制。

1. 创新阶层聚集机制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是城市创新的原动力。城市人力资本不仅来自内部积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更取决于外部人力资本的流入(夏怡然、陆铭, 2019)。城市包容性主要通过人才吸引机制发挥作用(Qian, 2013),即通过吸引创新阶层的集聚促进城市的发展。Boschma和Fritsch(2009)利用欧洲七国数据研究,发现创新阶层在城市间的占比对技术创新起显著正向作用。

城市包容性主要从三个方面吸引创新阶层聚集:一是能够降低进入城市的门槛;二是城市包容性的异质友好特征对特立独行、新思维、失败和高风险具有更高的包容性,从而为创新阶层提供更好的社会理解和鼓励自我表达的制度环境(Florida et al., 2008);三是城市包容性的群体多样特征促进了城市中消费设施的多样性,包括民族特色产品、商店和餐馆等,从而提高了城市聚集力和吸引力(Quigley, 1998; Glaeser et al., 2001; Ottaviano and Peri, 2006)。

创新阶层聚集机制从促进创新创业活动(Boschma and Fritsch, 2009; Acs et al., 2013)、增加就业等方面促进城市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了城市创新创业型人力资本质量,吸引了大量企业在此选址(Florida and Gates, 2003);另外,创新阶层是在不同公司和行业之间传播知识的渠道,创新阶层自身也会调动资源,成立新的组织或公司。二是创新阶层的存在可能引致对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多样化,更大的需求市场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和就业机会,有利于创意产业的发展,而创意产业是城市发展的驱动因素(Currid, 2007)。

2. 溢价机制可对城市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

城市包容性的异质友好特征通过审美舒适溢价和文化溢价对城市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审美舒适溢价是指通过便利设施在供给侧对房价产生影响(Florida and Mellander, 2010)。城市包容性吸引艺术家、波西米亚人和同性恋者等异质性群体在此集聚,而这类群体是便利设施的直接使用者,他们的存在使城市在文化设施、社区

特色和住宅美学品质等方面得到提升，从而对城市住房形成审美舒适溢价。文化溢价促使自我表达和创意的产生，自我表达是与更高的 GDP 和经济增长水平相关联的核心因素（Inglehart and Norris, 2003；Inglehart and Welzel, 2005）。除此之外，自我表达还与更高水平的创造力、创新和创业行为有关（Fredrickson, 2001）。

3. 知识溢出机制对城市创新创业活动具有积极作用

知识溢出是区域或地方现象，随地理范围的扩大而减少（Rosenthal and Strange, 2008）。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具有不同的知识储备和价值观念，当他们会聚在一起时就产生了群体间的认知距离和认知差异（朱盼、孙斌栋, 2017）。城市包容性可从两个方面实现知识溢出机制，第一，城市包容性允许知识和思维角度的巨大差异，鼓励不同群体融合，增加交流与学习的机会（Qian, 2013）。在某些情形中，一群技能有限但认识多元的人可能比高技能的同质化群体更加高效（Hong and Page, 2001）。第二，城市包容性吸引了知识工作者，增加了城市的创意资本，从而改善了知识增长前景（Florida, 2002）。

知识溢出机制对城市创新创业活动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有助于降低知识信息尤其是缄默知识的交流成本，促进技术扩散和新知识创造，从而导致产品改进和新产品产生（Lorenz and Schmutzler, 2018）。第二，创业知识溢出理论认为，新知识是创业机会的重要来源之一，新知识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有较高水平的创业活动。第三，知识溢出的增加有利于提升知识的多样性与认知的深度，形成开放性与多样化思维，从而促进创业机遇的发现与创新问题的解决。

4. 风险平滑机制对创新创业活动具有激励效应

城市包容性通过“风险平滑机制”形成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激励效应。城市包容性越高，创新创业活动发生概率就越高。一方面，城市包容性催生本地风险投资等资源配置机构的产生与发展，吸引外来风险投资机构的入驻，既降低了创新创业活动的成本与失败概率，又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使企业更有动力投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从城市包容性的发展导向来看，城市包容性意味着地方政府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等同于“市民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如子女入学、住房保障以及医疗养老保险等，通过直接的风险平滑效应提高了流动人口的风险承担能力，同时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感，促使他们去追寻更高的商业满足感，从而激发流动人口的创业动机。因此，城市包容性既有利于促进流动人口创业，也有助于创业层次的提高（周颖刚等, 2020）。

5. 循环累积机制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城市包容性能够通过循环累积机制实现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较高的城市包容性既具有推动自身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内生驱动力，也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正向循环效应。

一方面，包容性所引致的创新创业活动在城市的集聚可使其经济更加依赖新技术开发，从而提升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支持力度。如当地政府因出台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

度、措施,从而提升了创新创业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使得创新创业活动面临更少的成本、获取更大的便利。可见更高的外界支持力度显然更有利于创新创业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刘洋等,2019)。另一方面,创新创业活动的集聚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促进了城市的包容性。越多样化的地区其平均工资越高,工资涨幅也越高(Dohse and Gold, 2014);反之,城市包容性带来的经济收益使得本地区居民具有更高的包容性,从而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更高层次的接纳与包容(刘洋等,2019)。

五、城市包容性研究的启示及未来展望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城市包容性所包含的异质友好、群体多样与发展导向更符合新时期的发展需求。但由于这一概念最早从西方产生,因而它的使用需要融合中国的现实特征、应用情景和内在要求,从而更好地为中国城市发展服务。因此,未来城市包容性研究要立足于中国城市制度基础,适应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环境。

(一) 西方城市包容性研究的不足

城市包容性概念主要内生于西方的经济社会环境,因此虽然国外学者的研究能够为国内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但也存在明显不足。第一,到目前为止,国外的研究虽然在概念和理论方面开拓了新思路,但在实证分析方面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有关审美舒适溢价等的研究还比较初步,如果不加以分析直接引用,可能造成错误。第二,城市包容性测算指标在中国的合理性和适用性亟须辨析。西方学者认为提高城市包容性的一个主要途径是注重以包容性为特征的人文环境,但对具体如何营造这一社会环境缺乏深入研究。如将同性恋指数、基督教政党选票份额等作为城市包容性的主要度量指标,实际上这种测算主要适用于西方政治社会特点,不适合我国的价值观,因此今后应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反映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包容性量化指标。第三,西方城市包容性研究是在西方国家城镇化率长期稳定在较高水平背景下展开的,关注的焦点更多的是城市对创意阶层和少数民族群的包容性。因此虽然西方学者的城市包容性理论可以作为中国城市包容性研究的参考,但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和内在要求,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服务。

(二) 对中国城市包容性制度建设的思考

我国城市包容性制度建设主要包含经济包容性、社会包容性、文化包容性。经济包容性的主旨,是强调以人为本,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营商环境优化,营造开放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全面激活各创新主体和生产要素的活力;社会包容性意在采取渐进方式逐步弱化户籍制度约束,着手住房类公共产品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整合碎片化社会保障制度,推进社会救助和扶贫开发制度改革,破解民生保障难题;文化包容性则是重视开放包容,通过多元文化建设提高城市人才吸引力。因此,未来中国城市包容性制度建设应更加重视通过经济制度包容性建设促发展,通过社会包容

性制度建设保基本，通过文化包容性制度建设补短板。

（三）城市包容性未来研究展望

党的十八大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我国城镇化开始进入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发展阶段。城市发展将更多地依靠城市间高水平的人才流动，为此具有人才吸引力的城市包容性建设将日益得到重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国的城市包容性制度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以提高城市质量为发展目标。为此深入研究城市包容性的目标导向和内在原理，并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将有利于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未来城市包容性研究应在补足西方研究不足和融合中国已有制度建设基础上，着重在基本目标转变、理论内涵更新、定量测算优化、影响因素探索、制度设计调整等五个方面加强研究。

第一，城市包容性目标应从简单提高城市吸引力转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城市包容性的根本要义是强调以人为核心，无论性别、年龄、收入、观念等，均体现机会平等。作为后发追赶型大国，当前我国正面临城镇化转型的关键时刻，因此应在保证城市居民权利公平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营造包容性社会环境吸引更高质量人才流入，从而使包容性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有效发挥作用。为此，应厘清城市包容性建设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紧紧围绕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目标，构建更加系统、全面的城市包容性体系。

第二，城市包容性应在扶贫济弱理念基础上注重多样化的发展理念。目前国内研究多从分配角度解读城市包容性，将城市包容性视为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将城市包容性程度等同于弱势群体是否能够同等地享受社会服务和城市发展红利，以及城乡人口的融合程度。过去几十年里，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的确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缓解了不平等带来的社会矛盾，促进了城市发展，这也是新发展阶段必须继续坚持的方向。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居民的生存需求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追求个人发展的需求正逐渐凸显。与此同时，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高水平人才短缺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制约问题凸显。因此，当前以分配为主导的城市包容性亟须向以增长和发展为主导的城市包容性转型。城市包容性的内容亟须拓展，应增强对具有高知识、高技能、创新型人才吸引与聚集的重视。

第三，城市包容性定量测算应从侧重单一指标选择向指标体系优化转变。当前城市包容性在定量测算和评价上侧重特定指标的单一维度，然而随着实践的推进，城市包容性的量化研究更需要系统性设计。城市包容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涵盖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经济包容性应增强以效率优先或成本降低为引导的要素包容；文化包容性应增强对同性恋等特定群体的关注；社会包容性应侧重对多样化人口的引入。此外，未来测算角度也应逐步增多，针对不同群体的类别应形成不同的包容性，如对不同能力（受教育程度、经济能力）、不同职业、不同出身等类别群体增

加包容度。

包容性量化问题除了指标选择的难题之外，数据缺口也是一项重要制约因素。已有的统计方法对于城市包容性的概念定义、口径范围、计算方法、调查方法等来说是全新的，无法完全满足对城市包容性目标的监测和实施的新需求，需要加强数据的可获得性。因此未来关于城市包容性的研究应聚焦于可以量化的城市包容性数理模型，城市发展研究应纳入城市包容性因素。

第四，城市包容性影响因素应从单一经济因素转向创新、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因素。在探索如何加强城市包容性建设的思路中，中西方理论与实践操作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中国的城市包容性以政府对弱势群体社会权利的保障为基础，更侧重于从经济环境入手进行城市包容性建设，实现自上而下的包容，这种做法在经济建设初期通过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入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西方的城市包容性以居民对特定群体社会活动的接纳为基础，强调对“特立独行的人”的吸引力，欲通过多元化人才的融合提高城市发展质量。

既往研究在影响城市包容性因素以及如何提高城市包容性方面尚有所欠缺，未来应结合中西方城市包容性建设的成功实践经验，从经济、创新、制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着手，探索城市包容性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形成切合我国国情的实施路径。

第五，城市包容性制度设计应从注重供给侧为主转向供需双侧并举。目前中国的城市包容性制度建设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但是更侧重于经济包容性，重点从供给侧提供各种保障制度。随着城市包容性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制度设计应更加注重供需双侧并举。一方面从供给侧着手，构建更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科学丰富的包容性制度体系，探索和推进监管体系等制度创新，增加生态包容性等新的内容。另一方面注重满足大众就业、发展、教育、健康等需求，营造鼓励和包容的社会环境，实现社会保障可持续性和提高人才吸引力的双重目的。

参考文献

何景熙 (2011):《包容性发展:中国城市化的导向选择——基于社会系统进化原理的解析》,《社会科学》第11期,第64—72页。

洪扬、陈钊、张泉、李辉 (2021):《中国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的综合测度及比较——基于我国18个城市群的数据分析》,《现代城市研究》第5期,第106—111、125页。

李叶妍、王锐 (2017):《中国城市包容度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期,第146—154页。

刘洋、周密、刘曙光 (2019):《文化包容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与居民创业精神的影响》,《产业经济评论》第1期,第133—153页。

陆铭、欧海军、陈斌开 (2014):《理性还是泡沫:对城市化、移民和房价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第1期,第30—54页。

倪明胜 (2012):《包容性发展的核心要义及其政策指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9期,第

33—34、29 页。

王晓艺、翟晓凤、杨飞虎（2019）：《我国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价格月刊》第 8 期，第 74—79 页。

魏婕、任保平（2011）：《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的测度：1978—2009》，《中国工业经济》第 12 期，第 5—14 页。

夏怡然、陆铭（2019）：《跨越世纪的城市人力资本足迹——历史遗产、政策冲击和劳动力流动》，《经济研究》第 1 期，第 132—149 页。

[挪] 詹·法格博格、[美] 戴维·莫利、[美] 理查德·纳尔逊（2009）：《牛津创新手册》，柳卸林、郑刚、蔺雷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张明斗、王雅莉（2016）：《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综合测度及驱动因素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第 6 期，第 118—124 页。

周颖刚、蒙莉娜、林雪萍（2020）：《城市包容性与劳动力的创业选择——基于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财贸经济》第 1 期，第 129—144 页。

朱盼、孙斌栋（2017）：《中国城市的企业家精神——时空分布与影响因素》，《人文地理》第 5 期，第 105—112 页。

Acs, J., B. Audretsch and E. Lehmann (2013),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1 (4), pp. 757 – 774.

Alesina, A. and E. L. Ferrara (2005),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3 (3), pp. 762 – 800.

Bairoch, P. (1988), *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Dawn of History to the Pres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kens, J., P. Mulder and P. Nijkamp (2013), “Economic Impacts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Netherlands: Productivity, Utility, and Sorting”,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3 (1), pp. 8 – 36.

Boschma, A. and M. Fritsch (2009), “Creative Class and Regional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even European Countries”, *Economic Geography*, 85 (4), pp. 391 – 423.

Bosetti, V., C. Cattaneo and E. Verdolini (2015), “Migration of Skilled Workers and Innovation: A Europe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6 (2), pp. 311 – 322.

Brunow, S. and B. H. renzel (2012), “The Effect of a Culturally Diverse Labour Supply on Regional Income in the EU”, *Empirica*, 39 (4), pp. 461 – 485.

Case, C. E., A. M. Greeley and S. Fuchs (1989), “Social Determinants of Racial Prejudic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2 (4), pp. 469 – 483.

Currid, E. (2007), *The Warho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ohse, D. and R. Gold (2014), “Determining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versity on Regional Economies in Europe”, *WWW for Europe Working Paper* No. 58, 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125710/1/WWWforEurope_WPS_no058_MS101.pdf [2021 – 06 – 18].

Dohse, D. and I. Ott (2014), “Heterogenous Skills, Growth and Convergenc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30, pp. 52 – 67.

Easterly, W. and R. Levine (1997), “Africa’s Growth Tragedy: 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4), pp. 1203 – 1250.

- Fassio, C., F. Montobbio and A. Venturini (2019), "Skilled Mig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European Industries", *Research Policy*, 48 (3), pp. 706 – 718.
- Florida, R.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Washington Monthly*, 35 (5), pp. 593 – 596.
- Florida, R. and G. Gates (2003), "Technology and Tolerance: The Importance of Diversity to High-technology Growth", *Research in Urban Policy*, 9, pp. 199 – 219.
- Florida, R. and C. Mellander (2010), "There Goes the Metro: How and Why Bohemians, Artists and Gays Affect Regional Housing Value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0 (10), pp. 167 – 188.
- Florida, R., C. Mellander and H. Qian (2012), "China's Development Disconnec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4 (3), pp. 628 – 648.
- Florida, R., C. Mellander and K. Stolarick (2008), "Inside the Black Box of Regional Development—Human Capital, the Creative Class and Toler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8 (5), pp. 615 – 649.
- Fujita, M. (1989), *Urban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edrickson, B. L. (2001),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 (3), pp. 218 – 226.
- Gauthier-Loiselle, M. and J. Hunt (2010), "How Much Does Immigration Boost Innov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 (2), pp. 31 – 56.
- Gibson, L. (1992),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Intolerance: Cultural Conformity and Political Freedo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2), pp. 338 – 356.
- Gibson, L. and K. L. Tedin (1988), "The Etiology of Intolerance of Homosexual Politic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69 (3), pp. 587 – 604.
- Glaeser, E. L., J. Kolko and A. Saiz (2001), "Consumer C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 (1), pp. 27 – 50.
- Gotham, K. F. (2002), "Marketing Mardi Gras: Commodification, Spectacle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ourism in New Orleans", *Urban Studies*, 39 (10), pp. 1735 – 1756.
- Hong, L. and S. E. Page (2001), "Problem Solving by Heterogeneous Ag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97 (1), pp. 23 – 163.
- Inglehart, R. and P. Norris (2003), *Rising Tide*,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 and C. Welzel (2005),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cobs, J. (1969), *The Economies of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Quigley, J. (1998), "Urban Divers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 (2), pp. 127 – 138.
- Mellander, C. and R. Florida (2011), "Creativity, Talent, and Regional Wages in Sweden",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46 (3), pp. 637 – 660.
- Lazear, E. P. (1999), "Globalization and the Market for Teammates", *Economic Journal*, 109, pp. 15 – 40.
- Ley, D. (1994), "Gentrif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Middle Clas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2 (1), pp. 53 – 74.

Lee, S. Y., R. Florida and A. Zoltan (2004), “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A Regional Analysis of New Firm Formation”, *Regional Studies*, 38 (8), pp. 879 – 891.

Lee, N. (2011), “Ethnic Diversity and Employment Growth in English Cities”, *Urban Studies*, 48 (2), pp. 407 – 425.

Lee, N. (2014), “Migrant and Ethnic Diversity, Cities and Innovation: Firm Effects or City Effect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5 (4), pp. 769 – 796.

Niebuhr, A. (2010), “Migration and Innovation: Does Cultural Diversity Matter for Regional R&D Activity?”,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9 (3), pp. 563 – 585.

Noland, M. (2005), “Popular Attitudes, Globalization and Risk”, *International Finance*, 8 (2), pp. 199 – 229.

Nathan, M. (2011), “The Long Term Impacts of Migration in British Cities: Diversity, Wages, Employment and Prices”, *SERC Discussion Paper 67*, SERC.

Ostheimer, M. and L. G. Ritt (1982), “Abundance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 Test of Dire Predi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44 (2), pp. 365 – 387.

Ottaviano, G. and G. Peri (2006), “The Economic Value of Cultural Diversity: Evidence from US C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6 (1), pp. 9 – 44.

Persell, C. H., A. Green and L. Gurevich (2001), “Civil Society, Economic Distress, and Social Tolerance”, *Sociological Forum*, 16 (2), pp. 203 – 230.

Qian, H. (2010), “Talent, Creativ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China”,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45 (1), pp. 133 – 156.

Qian, H. (2013), “Diversity Versus Tolerance: the Social Driver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US Cities”, *Urban Studies*, 50 (13), pp. 2718 – 2735.

Qian, H. F. and S. Q. Liu (2018),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U. S.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40 (8), pp. 1043 – 1065.

Rosenthal, S. S. and W. C. Strange (2008), “The Attenuation of Human Capital Spillover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4 (2), pp. 373 – 389.

Epstein, S. (2017), “Urban Governance and Tolerance: The Regulation of Suspect Spaces and the Burden of Surveillance in Post-World War I Asheville, North Carolina”,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43 (5), pp. 683 – 702.

Lorenz, E. and J. Schmutzler (2018), “Tolerance, Agglomeration,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Latin American Region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7 (2), pp. 243 – 268.

Saiz, A. (2003), “Room in the Kitchen for the Melting Pot: Immigration and Rental Pric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5 (3), pp. 502 – 521.

Sparber, C. (2010), “Racial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roductivity: Industry Level Evidence”,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Smith, W. L. and S. Sassen (2006),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Teaching Sociology*, 23 (4), p. 426.

- Smith, N. (1996),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London: Routledge.
- Thomas, J. M. and J. Darnton (2006), "Social Divers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etropolis",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21 (2), pp. 153 – 168.
- Tuch, S. (1987), "Urbanism, Region, and Tolerance Revisit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4), pp. 504 – 510.
- Zukin, S. (1995), *The Cultures of Cities*, Cambridge,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Review of Urban Tolerance and Research Prospects

ZHOU Mi¹, ZHANG Ying-xin²

- (1. China Research Center for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Improving urban toleranc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and inevitable trend of promoting the human-oriented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urban tolerance research. Based on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tolerance (heterogeneous friendliness, diversity of groups, an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urban tolerance on major economic variable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and the comparison of research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ficiencies of western studies on urban tolerance and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urban tolerance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enlightenment of urban tolerance on China's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easibl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on urban tolerance from five asp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als, the updating of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the optimization of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and the explor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adjustment of institution design.

Key Words: urban tolerance; new-type urbanization; heterogeneous friendliness; diversity of groups;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责任编辑: 薛亚玲